

《释名》
认知研究

胡佩迦

郑莉娟

陈爱香◎著

H I M I N G R E N Z H I Y A N J I U



四川大学出版社

《释名》
认知研究

胡佩迦
郑莉娟
陈爱香◎著



S H I M I N G R E N Z H I Y A N J I U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 凯
责任校对:孟庆发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释名》认知研究 / 胡佩迦, 郑莉娟, 陈爱香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7-5614-8140-0

I. ①释… II. ①胡… ②郑… ③陈… III. ①训诂②
《释名》—研究 IV. ①H131.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1426 号

书名 《释名》认知研究

著 者 胡佩迦 郑莉娟 陈爱香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8140-0
印 刷 四川永先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4.625
字 数 116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 言

东汉学者刘熙所著的《释名》一直以来在我国学术界褒贬不一，颇受争议。传统的学术观点认为《释名》是一部唯心主义色彩极其浓厚的著作，而它受到批判则是因为其声训大多被指责为没有根据的主观臆断，当然学者们也从《释名》摆脱经学附庸，避免牵强附会的道德说教的角度对它进行了积极的评价，认为它是第一部真正从语言学角度进行名物释源的著作，是我国第一部语源学词典。但是总体上《释名》一直没有得到主流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随着语言研究的不断深入，语言学由客观的描写逐渐转为理论的阐释，人们不再仅仅局限于了解语言形式到底是什么，更希望了解语言形式为什么形成这样的结构。由于研究思路、方法的转变，人们对《释名》的看法开始有了转变。随着对语言理据学的重新关注，人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解语言符号音义结合的关系之上，即《释名》的序言中所提到的“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我们在这里把它解释为在给事物命名时研究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人们把这个语音而不是那个语音赋予了该事物。当然在这里需要澄清的是，我们所探讨的原因并不是对结果有不可改变的必然决定因素，而是推动音义结合模式向一定趋势发展的动力。它并不决定或规定什么音必然与



某个事物或概念相结合，但它促动一种趋势使得某一类型的音往往与某一类事物或概念联系在一起，使得它们在语言符号的创制过程中结合在一起形成词语的几率比与其他的音和义结合在一起的几率更高。而促成这种趋势的动力就是语言理据学的研究对象——语言的理据。

而要想了解语言的理据，不能只是局限于语言系统内部，还需要了解使用语言的人的心理认知以及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认知语言学正是建立在经验现实主义哲学观基础之上的语言学理论，它认为人类的语言来自认知，是人类认知能力的一部分。而认知能力正是建立在对外部世界的感知体验基础之上的。基于这一观点，认知语言学提出认知隐喻、转喻、意象图式、典型范畴等相关理论，在分析和解释语言现象时，对以往的语言理论难以说明的问题给予了有说服力的解释。

《释名》一书具有浓厚的经验主义性质，作者刘熙的阐释是基于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熟悉掌握，针对当时普通社会大众写成的著作，它脱离了以往训诂书籍对前人故训的沿袭，尽力避免道德说教和伦理宣扬，更真切地反映了当时人们思维的面貌。基于上述因素，我们认为用认知语言学理论来研究《释名》不但是可行的，而且还大有潜力可挖。用认知语言学理论来研究《释名》还可以为我们了解语言、认知和现实体验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有积极意义的参考，为我们了解人类语言的共性作出尝试。

在《释名》中存在大量认知隐喻现象，根据目标域事物的属性特征，我们将这些隐喻划分为四大类的隐喻场：生命隐喻场、非生命隐喻场、非实体隐喻场和类比隐喻场。每个隐喻场内又包含数个下属的子隐喻场，如生命隐喻场中包含植物隐喻场、拟人隐喻场、泛生命隐喻场。

同时我们还发现,《释名》中存在为数不少的转喻现象,其中包括整体与部分、动作与动作对象、事物与其所处环境、因果联系等转喻关系。本书还着重分析了《释名》中独特的针对时间概念的转喻现象。

本书最后分析了《释名》中对典型范畴的运用。我们发现《释名》在阐释很多颜色词或抽象概念时,都是以该概念范畴中最典型的成员作为列举对象的。这反映了人们在认知和建立概念范畴时都是以具有典型性特征的事物为中心来建立概念范畴的。

本书对《释名》的认知研究还处于相当粗疏的阶段,由于笔者学识浅陋,还有很多问题不能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在这里只是想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使大家可以对以认知语言学来研究汉语语言现象的路子引起更多的关注,更多地参与其中,完善我们对汉语的研究。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释名》性质评价

本书的写作目的在于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对《释名》一书进行研究考察。要研究《释名》，首先要对《释名》一书的性质有一个清晰全面的认识。《释名》的作者刘熙，字成国，东汉青州北海（今山东潍坊西南）人，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在东汉末年，是汉献帝刘协建安时期人，他写《释名》应不晚于公元220年。^①“《释名》到清代才有注本，最早的是毕沅的《释名疏证》，后有王先谦的《释名疏证补》、成容镜《释名补证》和吴翊寅的《释名疏证校议》。”^②本书选择了王先谦的《释名疏证补》这一版本作为研究分析的对象。不少学者对《释名》的研究已经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提出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理论和方法，这无疑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捷径。而且也有学者抱着和我们一样的目的，力图从一个新的视角对

① 邓文彬：《中国古代词源学的建立与刘熙〈释名〉的地位和影响》，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9期。

② 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释名》进行分析研究，他们所做的归纳梳理工作作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大量有建设意义的材料和数据，在对《释名》一书的性质进行探讨时，我们不妨借鉴前贤时人的研究成果来进行说明。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王闰吉的硕士学位论文《论〈释名〉的理据》（2001）就从词语理据的角度对《释名》进行了研究，该文将前人对《释名》一书的性质的理论观点分为如下五类：

第一是认为《释名》是一部声训专著，如濮之珍（1987）、李茂康（1997）、卢烈红（1991）、祝敏彻（1988）等；第二是认为是同源词研究专著，如路广正（1996）等；第三是认为它是语源、词源或字源学著作，如黄典诚（1986）、孙德宣（1956）、吴辛丑（1998）、陆宗达（1983）等；第四是认为《释名》是义书，如黄侃（1983）在列出“十种根柢书”时把《释名》归入义书一类，李开（1989）也持此观点；第五是认为《释名》是“探索词的理据的鸿篇巨制”，是“带试探性的理据词典”如黎良军（1995）、符淮青（1997）等。^①

在诸家学者的观点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对《释名》的声训方法、语源学意义以及在词语理据方面所做的探索和研究。下面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对《释名》的性质进行探讨。

^① 王闰吉：《论〈释名〉的理据》，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第7页、8页。

一、《释名》的声训方法

在学术界对《释名》的评价中，“声训”是一个频繁出现的字眼。一谈到《释名》，人们很容易把它和声训联系在一起，因为《释名》全书中有大量的训释材料都是通过被释词与训释词在声音上的相同或近似而联系起来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释名》全书自始至终都贯彻了声训的释词原则，使用声训之多是其他著作不能比拟的。”^①而要探讨声训，首先就必须对声训的实质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首先来看看学术界对声训的定义：

声训，古人也叫“谐声训诂”。它是用音同或音近的词去说明被释的词的来源，也就是以词的语音形式（声音相谐）为先决条件来说明两词之间的语源关系。这种探索词源的方式导源于先秦，盛行于两汉，集大成于《释名》。^②

声训又叫音训，它采用音同、音近或双声、叠韵的一个词来解释另一个词。^③

声训是用音近义通的词来作训，因为训释词与被训释词之间有词音的关系，所以被称作声训。但是，声训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显示读音，而仍是为了显示意义。^④

从上述这些关于声训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点：

① 李恕豪：《中国古代语言学简史》，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99页。

②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

③ 李恕豪：《中国古代语言学简史》，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36页。

④ 王宁：《训诂学原理》，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版，第62页。



首先，使用声训对词语进行训释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基础，即词语的声音与词语的意义之间的联系是有原因的，一个词语发什么样的声音与这个词语所表示的事物或概念的性质有关。正是由于有这样一种信念的支撑，人们才会着手去寻找各种途径，试图弄清词语的声音与意义之间的关系，而声训正是这诸多途径中的一种。

其次，声训是在两个以上词语之间建立一种联系的过程或手段，而促使这一过程发生的直接原因则是词语之间在语音这一物理特征上相同或类似。可以说声音作为一种具体可感的标记特征是声训存在的物理基础。而这一特点的生理基础则在于人们主要是通过耳朵这一听觉器官来接受语言信息的，语言符号首先是作为声音为人们所感知和认识的，所以人们也最易倾向于从声音上来对语言进行分析。

再次，我们发现学界在对声训进行定义时都涉及探讨声训的目的。因为声训本质上只是一种手段，人们通过这个手段要达到的目的是探求词语的来源，即词语的声音和意义之间的关系在最初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而这就是所谓的语源、词源。前面我们也谈到声训是在两个词语之间建立联系，而要在词语之间建立联系首先就要发现词语之间的相同之处，人们在接触词语时首先感知到的就是词语的语音形式，因此在寻找词语间的相似之处时也最容易从语音入手。而追溯语源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发现词语在意义上的前因后果的关系，所以声音的相似之处最后还必须和意义建立起联系。由此我们可以说用声训来推求语源实际上就是从词语语音的相似性上入手来建立词语在意义上的联系。

由此看来，声训究其本质是把语音上的相同或相似看作是意义上同源的物理标记，这与认知隐喻运作的心理机制在实质

上是相同的（该理论认为隐喻即是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之上的两个概念域之间的投射），都是建立在相似性基础之上的概念联系。它反映了人们的心理认知经验往往容易从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入手来观察、探求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认知机制可以推广到我们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对事物进行分类，建立各种概念范畴就是以外部形态或性质属性上相同或相似来作为划分标准的。如果两个人有着相似的面孔，我们会猜测他们可能是同一家族、有血缘关系的成员；而对不同人种的区别和认知不也是基于共同的肤色和其他一些明显的共同生理特征来进行归类的吗？所以当人们发现两个语言符号在发音上具有相同或相似之处时，就会很自然地联想到两者在意义上具有诸如同源或派生之类的某种联系。我国先秦文献中最早出现的声训就是在这一认知特性的影响下产生的，如《周易·说卦》中的“乾，健也”“坤，顺也”，《论语·颜渊》中的“政者，正也”，等等。人们的这一认知特性决定了人们倾向于从一些具体而易于感知的特征入手来发现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而声训正是人类这一认知特性的反映。

传统学术界对《释名》声训的评价多认为其有许多“主观臆断”之处，认为它的声训缺乏客观依据和可信度。学者们在总结其错误的原因时主要归纳为两点：一是“《释名》对于训释范围掌握不当而产生的错误”^①。语言中关于自然界的动植物的名称都属于语言产生过程中第一批被创造出来的词语，属于最基本的词汇，这些词语的声音和意义之间大多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约定俗成的，所以是没有得名之由可讲的。而《释

^① 李恕豪：《中国古代语言学简史》，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105页、106页。



名》对这类词语却偏偏要给出一个得名的缘由，所以难免给人以荒唐、不可信之感。二是“刘熙不太重视故训，他随心所欲地把两个声音有关系的词罗列在一起，加以解释，这就使《释名》这部词源学著作，在许多地方没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①。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观念、理论的发展，目前学术界对《释名》的声训又有了新的评价。

首先，学者们在探讨人们到底如何给事物命名时发现词语的音义产生联系也不是完全随心所欲与任意的，而是建立在对事物属性特征的认知上的，即人们在给一个事物命名时，很大程度上要受该事物的属性特征的影响，人们并不是随意称呼这些事物，事物的名称部分反映了人们对该事物的认知。有学者就指出：

事物的命名往往反映了各民族的认知过程和事物的特征，而这种认知过程和特征与各民族长期形成的观察和思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各民族对具体事物的命名方式不一样，但古今中外，人们在观察和描述事物的过程中，几乎都十分关注事物的外部特征，如颜色、形状、用途等，并以此作为给事物命名的依据。^②

由于不同的民族文化、文化心理对一个民族在认知方面的影响是不同的，所以不同民族的认知既有共性也有特性，正是不同民族间认知的特性造成同一事物在不同民族的语言中会有不同的名称。这一发现提示我们对一些最初创造的词汇的语源

^① 李恕豪：《中国古代语言学简史》，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105页、106页。

^② 王闰吉：《论〈释名〉的理据》，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第15页。

进行追溯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些词语的音义结合中可能包含人们最初认识这些事物的特征属性的线索。所以我们不能忽视《释名》在对一些基本词汇的语源推求中所包含的客观因素。许多学者在对《释名》中的训释条目进行分析后发现：

通过细致分析《释名》中的声训，便可发现训释词在多数情况下不能成为被释词的一个义项，即声训不具有直接解释词义的性质。……因此，可以看出《释名》的声训并不是直接对词义的训释，而是对词或是词所表示的名物的某一重要特点作一个勾勒，从而让人们更准确地理解它们。……《释名》的声训多是从语词或语词所表示的名物的性质、特点、形状、用途、位置、数量、使用情景等方面来诠释的。^①

其次，近年来人们在对《释名》进行重新认识和研究时发现：《释名》并没有忽视前人的训诂成果。有人作过一个统计：

《释名》的训释同前人相同、相近、相关或相及的共 1169 条，占所训释所有条目 1502 条（这里不包括同名同实的）的 74.5%，涉及前人的书籍包括经典、《说文》、《尔雅》、《传注》、史记、纬书、字书、《方言》和其他，共九大类四十多种书籍。所本的书籍很有选择性，其中本于《说文》、《尔雅》和传注最多，分别为 269 条、202 条和 220 条，因为这三类书最可靠，相反，可信度不大的纬书为作者所本的不多，仅有 9 条（即使把《白虎通》算为纬

^① 郝士宏：《〈释名〉的声训与推源》，载《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1 期。



书也只有 59 条，据统计本于《白虎通》的共 50 条)。同时，作者所本的，并不完全照抄，而是有所发明和创新，《释名》所训与前人相同或相近的分别为 250 条和 79 条，而相关或相及的分别为 590 条和 209 条，发明和创新的占大多数。^①

这些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释名》对前人故训也是进行了广泛的参考的，只是《释名》不拘泥于前人的成果，不从解经、宣扬封建伦理的角度阐发意义，第一次真正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进行词语推源。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对《释名》中声训的认识我们应该采取更为客观的立场，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结为主观臆断，应该充分结合当时人们的认知水平，结合人类认知事物的认知特性，分析《释名》中的声训所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当然，我们不能否认《释名》中的声训有很大一部分是刘熙想当然地通过语音上的相同、相似而牵强地建立起的两个词之间的同源关系，但是当他建立起这种语音上的直观感性联系之后，他必须运用充分合理的阐释解说来使人们相信他的训释是有理可寻的，是有可信度的。所以他必须一方面考虑他那个时代人们的思维习惯、认知模式，来寻找一套可以让人们接受的概念、话语系统使自己的学说成立；另一方面，刘熙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也会在自己的学说中不知不觉地掺入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知、看法。语音只是作为形式上的一个具体可感的标记，它起到一个激活的作用，刘熙通过语音的相似性来激活两个概念范畴，以达到阐释的目的。在《释名》的序言中，他指出了著此

^① 王闰吉：《论〈释名〉的理据》，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第11页、12页。

书的目的：

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凡二十七篇。^①

可以看出刘熙是面向大众来进行词源阐释的，故他在进行阐释时必然要选择大众所熟知的概念范畴来解释不为大众所熟知的概念范畴。在声训的背后刘熙其实是以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所建立的概念范畴作为其词源阐释的主要依据的。因此刘熙在完成声训后所作的阐释或者说大胆的假设、猜想则成为研究他所处时代人们的概念认知模式和社会文化背景的第一手宝贵材料。所以本书中我们关心的不是刘熙用一个怎样的词语来训释另外一个词语，这两个词语是不是有同源关系，而是刘熙在之后所作出的阐释描述，他为何要作出这种描述，这种描述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他的认知的影响。从认知这个角度来看，《释名》中的声训还大有内容可挖。

二、《释名》的词源（或语源、字源）学意义

很多学者在谈到《释名》时都认为它是一部词源（或语源、字源）性著作：

《释名》是我国第一部汉语语源学（etymology）著作。^②

真正开始大规模地研究词的来源的，是刘熙的《释

^① 王先谦：《释名疏证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② 李恕豪：《中国古代语言学简史》，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97页。